

泉州港与古代 海外交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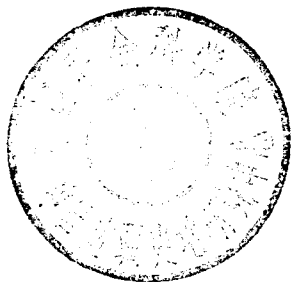
《泉州港与古代海外交通》编写组

95.73

0

泉州港与古代海外交通

《泉州港与古代海外交通》编写组



文物出版社

封面题字：虞愚

泉州港与古代海外交通

《泉州港与古代海外交通》编写组

文物出版社出版

北京五四大街29号

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787×1092 1/32开 字数：75千印张：3.75

1982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1068·1097 定价：0.56元

目 录

前 言	1
一 泉州港海外交通的兴起	
唐代以前的泉州港	2
唐代泉州港海外交通的发展	11
五代泉州的社会经济与海外交通	19
“刺桐港”名称的由来与中外 经济文化交流	25
二 泉州港海外交通的繁荣	
宋元时期泉州的社会经济	31
宋元泉州港海外交通的航线	45
宋元泉州港海外贸易的繁盛	50
宋元泉州港市舶管理制度	63
宋元泉州港繁盛的原因	67
三 宋元时期泉州与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	
中外人民的和睦相处	73
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	79
四 泉州港海外交通的衰落	
明清时期泉州港地位的下降	87
明清时期泉州港海外交通的新特点	96
明清时期泉州与亚非国家友好 关系的发展	108
后 记	116

前 言

泉州港是我国古代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，宋元时期曾以“刺桐港”而驰名中外。它为发展我国的海外交通和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，发挥过良好的作用。

泉州是我国福建省东南部的文化古城。早在周秦时期，越族人民就在这里劳动、生息。西晋以后，中原人民大批南迁，同当地人民共同开发建设这美丽的海疆。至南朝，泉州与国外往来，已见于记载。唐代，泉州成为我国南方对外通商的重要口岸之一。宋元时期，泉州港的海外交通更加发达；南宋至元代，泉州港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港之一。当时，泉州港内，外国的商舶云集，侨居泉州的亚非人数众多，泉州港的海外交通贸易达到了高峰。明清两代，由于元末泉州地区的连年战乱和倭寇、西方殖民者的侵扰，加以封建王朝的“禁海”和“迁界”，泉州港的海外交通贸易逐步走向衰落。

一千多年来，泉州港经历了它的兴起、发展、繁盛和衰落的过程，遗留下大量的遗迹和遗物，为我们研究海外交通、我国与亚非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，提供了很多有用的资料。我们编写《泉州港与古代海外交通》一书，就是利用这些资料并结合历史文献，加以综合叙述，从而把泉州港的历史面貌和发展概况，介绍给广大读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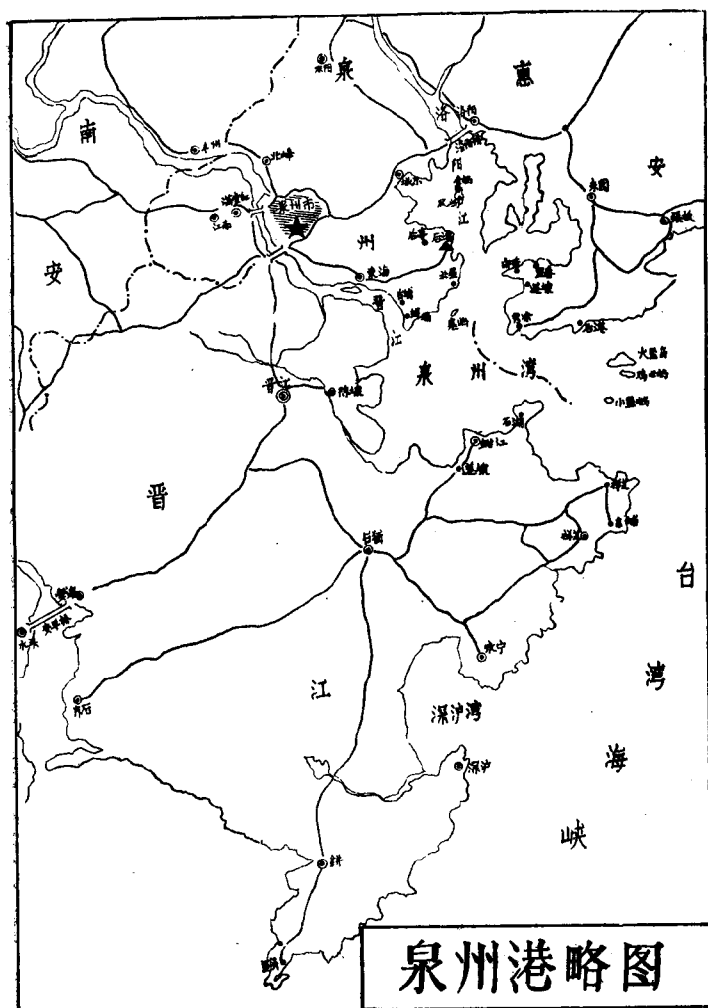
一 泉州港海外交通的兴起

唐代以前的泉州港

泉州港是福建省泉州市东南晋江下游滨海的港湾，它的范围除泉州湾外，还包括深沪湾、安平港和围头澳。泉州湾有后渚、石湖、蚶江等港口，而以后渚港为重要。泉州港扼晋江下游，水陆交通便利，水道深邃，港湾曲折，是个天然良港。在中世纪时就是我国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（图一）。

泉州，古时为越地，秦时属闽中郡，汉属闽越国，三国时为建安郡辖地。西晋太康二年（281年），析建安郡南部地区增设晋安郡，泉州属晋安郡。南朝末年晋安郡改称为丰州。隋开皇九年（589年）又把丰州改称为泉州，至此才出现“泉州”之名。不过，那时泉州州治设在今天的福州市，辖境包括了今福州及闽江流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。

入唐以后，随着福建南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繁荣，泉州的名称和辖地屡有更改。唐初，分泉州南部设置武荣州。唐景云二年（711年）改旧泉州为闽州，而以武荣州为泉州，州治设在今南安县的丰州。唐开元六年（718年），州治才移到今天的泉州，辖地北起莆田，南至龙溪，几乎包括了闽中和闽南地区。不久，泉州先与漳州



图一

分治，到北宋初又与兴化分治。元至元十五年（1278年）改为泉州路。明洪武元年（1368年）改路为府，辖晋江、南安、惠安、安溪、同安、永春、德化等七县。清雍正年间又与永春分治，所辖地只有晋江、南安、惠安、同安、安溪五县。

本书中所说的“泉州”，是指唐以后的泉州地区，重点是晋江流域，也就是今天的泉州市及其邻近各县。

我国是一个土地广大，人口众多的多民族的国家。春秋战国时期，居住在福建的是史称“百越”族系之一的闽越人。他们“处谿谷之间，篁竹之中”（《汉书·严助传》），聚居于近溪傍山的自然环境，从事生产活动。近年来在晋江流域的晋江、南安、安溪、永春、德化以及泉州市郊区等地，发现了数十处周秦以前闽越人的居住遗址及生产、生活用具等遗物，使我们了解到：最晚在周秦时期，这里的居民已经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。当时的农业生产已经种植水稻^①。南安狮子山遗址发现烧土中拌入稻草^②，永春九兜山发现印纹陶瓮内壁有稻秆和谷粒的痕迹^③，可见沿江两岸已种植了稻谷。纺织和制陶是当时两项主要手工业。尤其是制陶技术已经较为发达，所作陶器质地坚硬，造型美观，具有一定的水平。纺织物大体上已有“葛”。这时所使用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，虽然出现

① 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载：“楚越之地，地广人稀，饭稻羹鱼……”。

② 许清泉、王洪涛：《福建丰州狮子山新石器时代遗址》，《考古》1961年第4期。

③ 林惠祥等：《1956年厦门大学实习队报告》，《厦门大学学报》1956年6月。

了青铜器，但在生产中不占主要地位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居住在这里的闽越族人民，以自己的辛勤劳动，为开发福建南部地区作出了贡献。

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，把全国分为若干郡，福建属闽中郡。秦末汉初，闽越族首领无诸，因带领闽中兵参与反秦起义，又帮助刘邦攻灭项羽，被汉高祖封为闽越王^①，并改闽中郡为闽越国。嗣后，汉王朝为加强中央集权，汉武帝元封元年（前110年），废除国的名称，闽越国改称冶县，属会稽郡（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），直接受汉王朝统辖，从此闽越与中原的经济文化接触更加频繁。1958年在闽北崇安县发现了汉城遗址，出土了大批铁制生产工具，其中有农业生产用的铁口锄和机械零件铁齿轮，与中原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非常相似^②。闽江和晋江流域也发现汉代文化遗迹和遗物^③。闽越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，促进了当时泉州地区（指闽江和晋江流域）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。

秦汉时期，北起渤海、南至广东沿岸及台湾的海上交通都比较发达^④。在国外，北至今日朝鲜，东至日本^⑤，

① 《史记·东越列传》。

② 福建省文管会：《福建崇安汉城遗址试掘》，《考古》1960年第10期。

③ 许清泉、王洪涛：《福建晋江流域丰州地区考古调查》，《考古》1961年第4期。

④ 《后汉书·东夷列传》载：“会稽海外有东越人，分为二十余国。又有夷州（台湾）及澶州。……人民时至会稽市。”

⑤ 《汉书·地理志》载：“乐浪海中有倭人，分为百余国，以岁时来献见云”。

南至南海诸国以及印度洋以西的罗马帝国^①，都有海上交通相联系。这时造船技术也有很大提高，主要表现在船体的加大和船舶种类的增多。汉武帝时在豫章（江西）造的一种大船，称为“豫章大舡”，规模宏大，船上建有宫室^②。汉时所造的航海大船在甲板上有二至四层楼^③。民间近海交通工具更是多种多样。1975年福建连江出土的汉初独木舟，便是近海沿岸航行的一种船只。

三国时期的魏、吴两国，东临大海，都比较注意发展海上交通。吴国曾派船队往高句丽。公元230年，孙权派卫温、诸葛直带领由一万人组成的船队，航行到我国的夷州（即台湾）^④。吴国与南海诸国通商贸易也很广泛。公元226至231年间，孙权派遣朱应、康泰到林邑、扶南和其他一些国家。吴黄武五年（226年），曾有大秦（罗马帝国）商人秦论从海上经交趾北上谒见孙权^⑤。

吴国的造船业在当时最为发达。沿海主要造船地点有永宁（浙江温州）、横屿（浙江平阳）、建安（福建福州）等。吴在建安郡设置了专管造船的建安典船校尉。它所属的温麻船屯（在福州闽江口附近），是一个大的造船场所。公元280年，吴亡，晋将王濬缴获吴国的舟船就有

① 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载：“桓帝延熹九年（116年），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、犀角、瑇瑁，始乃一通焉”。

② 《太平御览》卷七六九引“汉官殿疏”，第四册3409页，中华书局。

③ 刘熙：《释名·释船》。

④ 《三国志·孙权传》。

⑤ 《梁书·海南诸国传》。

五千余艘^①，由此可见吴国造船业的发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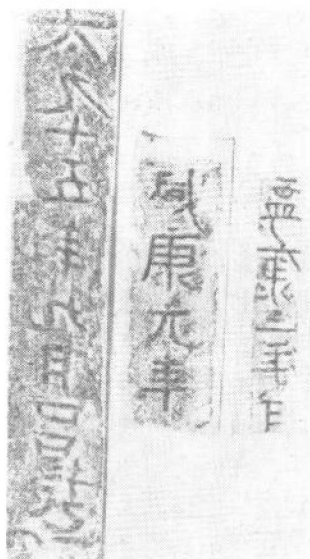
西晋末年，统治阶级内部爆发了诸王混战，使黄河流域生产遭受破坏。“雍州以东，人多饥乏，更相鬻卖，奔进流移，不可胜数”（《晋书·食货志》）。当黄河流域陷入大混战的时候，我国南方却较为安定。中原一部分士族和大批劳动人民，相继南迁。渡江来福建的士族，以林、陈、黄、郑、詹、邱、何、胡八姓为最多，这就是所谓“八姓入闽”。当时福建人口增多，据史书记载，晋安郡人口由原来的三千八百四十三户增至四千三百户（《晋书·地理志》）。“晋江”名称的由来，就是因“晋南渡时，衣冠避地者多沿江而居，故名”^②。解放后，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晋江沿岸进行考古调查发掘中，在南安丰州、永春城关的牛头寨等地，发现了用东晋咸康、宁康、太元年号纪年的花纹砖（图二）砌成的墓葬。从墓的结构和规模看，墓主应是南迁的士族。1973年在南安县丰州发掘一座东晋宁康三年（375年）的墓葬，出土了阴刻“部曲将印”（图三）一颗。“部曲”是地方豪强的私人武装。“部曲”的头目是“部曲将”，这说明定居在晋江流域的地主豪族已占有大量土地并拥有“部曲”这种私人武装。

避乱南来福建的中原劳动人民，带来了黄河流域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熟练的生产技术。他们与本地劳动人民共同开发泉州地区，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。

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，手工业也日益发达，最显著的

① 《三国志·吴书》。

② 《泉州府志·名胜》（乾隆版，下同）卷三。



图二 有纪年的晋墓砖拓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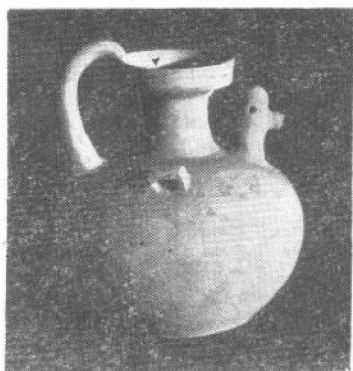
图三 南安丰州东晋墓出土的
“部曲将印”

是制瓷（青瓷）业。在古泉州地区发现的两晋至南朝的墓葬中，出土了大量造型美观、釉色晶莹的青瓷器。如南安丰州东晋宁康三年（375年）墓出土的天鸡壶（图四）；东晋咸康元年（335年）的青蛙水注；南朝元嘉五年（428年）墓葬出土的青瓷器（图五）^①等。瓷器的品种多样，无论釉色、造型都相当精美，制作技术有显著的提高。1973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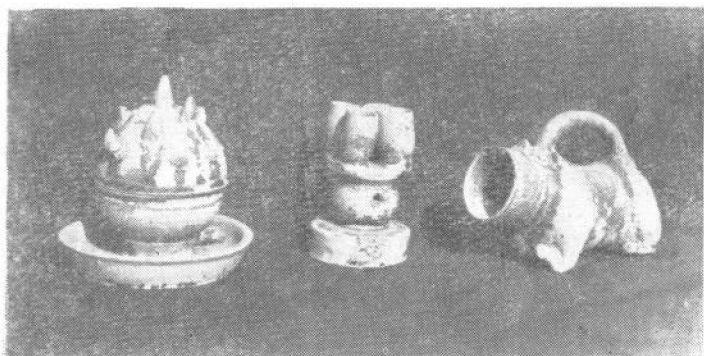
① 福建省文管会：《福建南安丰州东晋、南朝、唐墓清理简报》，《考古通讯》1958年第6期。

在晋江磁灶附近的溪口山，发现南朝窑址一处，规模很大，出土青瓷器残片与南朝墓出土的瓷器相似。这说明当时泉州已有规模较大的瓷器制作工场。

由于佛教和道教的传布，泉州也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寺观。南安丰州九日山下的延福寺，建于晋太康九年（288年），便是泉州地区最早的佛寺^①。城内的白云庙（今泉州市东街的元妙观），也建于晋太康年间，是泉州最早的道



图四 南安丰州东晋墓出土的天鸡壶



图五 南安南朝墓出土的青瓷器

^① 《泉州府志·坛庙寺观》卷一六。

观^①。

东晋至南朝，今福建广东等地战祸较少，社会生活相对安定，经济不断上升，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，当时我国与南海十余国通商，海上出现“舟舶继路，商使交属”（《宋书·夷蛮传》）的盛况。由于佛教兴盛，不少僧人往来南海诸国与中国之间。东晋隆安三年（399年），以法显为首的一批中国僧人，由陆路到了印度。十五年后，即义熙十年（414年）他们由今斯里兰卡经海道回国^②。法显描写当时他所搭乘的中国海船及航行情况说，船上可容乘客二百余人，大船后面系一条小船，准备大船遇难时救急之用。锚用石制，船上有帆，借风力推进，以天文观测导航，以日月星宿定方位^③。由此可见，东晋时由于通商贸易的繁荣，我国造船、航海技术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。

南朝时，泉州与海外地区往来已有文字记载。

南朝梁太清二年（548年）有一个印度僧人名叫拘那罗陀，由南海来到都城建康（今南京）。陈永定二年（558年）他由建康经江西至福建泉州，住在南安丰州九日山（在今泉州市西郊约六公里处）翻译《金刚经》。以后他由泉州乘船要到梭伽修国（今马来半岛），中途遇风停在越南；天嘉六年（565年）又乘船到泉州，改乘大船回国^④。

① 《晋江县志·寺观》（乾隆版，下同）卷一五。

② 张星娘：《中西交通史料汇编》第六册。

③ 法显：《佛国记》载：“大海弥漫无边，不识东西，唯望日月星宿而进”。

④ 《续高僧传》第二集卷一，第18—19页。

这就说明公元六世纪时泉州已有大船开往南海诸国。

公元589年，隋王朝最后灭了南朝的 陈，统一中国，结束了南北分裂割据的局面。隋王朝虽然仅仅存在三十八年，但它对航海事业相当重视，海上交通又有了新的发展。国内沿海各大港口之间，有固定航线，大陆与台湾之间的交通往来连续不断。隋炀帝曾在大业三年（607年）、四年（608年）、六年（610年）三次派出以朱宽、陈棱为首的船队到台湾^①，并有台湾居民五千户迁移到福建的福清县居住^②。与国外的交往，在东和朝鲜、日本继续保持经常往来；南则与今日的越南、缅甸、柬埔寨等东南亚各国有着更加密切的联系^③。

综上所述，泉州所处的晋江流域，经过秦汉、两晋、南朝至隋的不断开发，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；特别是西晋末年中原地区劳动人民大量入闽，与当地居民共同劳动，促使社会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，为对外通商和泉州港的兴起与繁荣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。

唐代泉州港海外交通的发展

公元618年唐王朝统一了中国。唐初，统治者推行了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，社会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。本来就少受战乱影响的泉州地区的社会经济，较之前

① 《隋书·东夷列传·流求国》。

② 何乔远：《闽书》（崇祯二年）。

③ 《隋书·南蛮列传·赤土》有关南洋交通的记载。

代又有了进一步的繁荣。

农业生产方面，劳动人民一面与江海争地，一面开发山区，扩大耕地面积。在晋江下游，围垦冲积的河滩；在晋江中上游，开辟了梯田。在泉州东南郊将大片碱地围垦为农田。至今这里的村庄还保留着“下围”、“大围”、“围口”、“浦西”等名称。大规模的农田水利设施也相继出现。唐贞元五年（789年），在泉州东郊开凿了“尚书塘”，周围二十八里，灌田三百余顷^①。贞元间又疏浚了“东湖”，使泉州东郊农地的灌溉初步得到解决。唐大和年间（827—835年），在通淮门外的晋江北岸，开浚了“漕泄江水，以肥沃南洋之田”的“天水淮”以及元和初凿北山下塘以灌民田的“仆射塘”^②等等，都是当时著名的水利建设工程，至今仍然起着灌溉作用。

手工业生产方面，瓷器的制作技术和生产规模继南朝之后又有所发展。当时浙江越窑的产品，釉色青翠可爱，是我国南方青瓷的代表作。唐代诗人陆龟蒙咏越瓷诗云：“九秋风露越窑开，夺得千峰翠色来”。极赞其釉色的美丽。泉州瓷器的制作深受越窑影响，产品也很精美。泉州地区唐墓出土的青瓷器可为例证。1973年，在晋江磁灶附近的童子山、狗仔山、后壁山、虎仔山等地，发现了数处唐代窑址，可见唐代泉州的制瓷业，已经相当发达。纺织业也有新的发展。当时泉州已是全国绢和紵的产地之

① 《泉州府志·水利》卷九。

② 《晋江县志·輿地》卷一。

一①。与丝织业有关的养蚕和植桑，在泉州也具有相当规模。唐初，仅泉州一个叫黄守恭的地主就有桑园七里。据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记载，当时泉州有“土贡：绵、丝、蕉、葛”的定例。唐人杜佑《通典》中也记有“清源郡贡绵二百两”。清源郡就是泉州②。这些都说明唐代泉州纺织业的发达。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还记载，泉州的手工业，除瓷器、纺织之外，冶铁和制盐也相当发达。

唐代，商品生产日益发展，商业繁荣，出现了长安、洛阳、扬州、广州等著名的城市。国际贸易也有很大发展。当时，我国对外交通有陆、海两线：陆路从我国西北，越过葱岭到中亚和小亚细亚等地；海路由沿海诸港，东北至朝鲜，东至日本，南达南海诸国。由于陆路交通线上，曾发生了多次战争（如唐与东西突厥的战争，阿拉伯与波斯的战争等），往往使交通阻塞。而且陆路运输主要靠骆驼商队，运量少、运费高。假如一头骆驼能驮运三百公斤货物，那么一支七百头骆驼的运输队所驮运的东西，只要用一艘像泉州湾出土的宋代大海船就可以运走了。正是因为海上运输有这样的优越性，所以海运事业得到很大的发展。

唐代，泉州已是我国对外贸易主要口岸之一，它和广州、扬州等被称为我国南方大贸易港③。当时兴起的阿拉

① 《唐六典》卷二〇载：“泉、建、闽之绢，泉、建、闽、表之紵，登、莱、邓之黼（布），并为八等”。

② 《泉州府志》卷三“建置沿革”载：“（泉州）天宝元年（742年）改为清源郡，乾元元年（758年）复改泉州”。

③ 伊本·考尔大贝《道程及郡国志》载：“中国贸易港自南向北，顺序记之：曰交州，曰广州，曰泉州，曰扬州”。